

车桥战役：揭开华中抗战反攻序幕

1944年3月5日至13日，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部队在粟裕率领下，向盘踞在江苏淮安车桥地区的日伪军队发起车桥战役。这次战役对日军重要设防据点实施攻城打援，打乱了日伪军“清乡”“屯垦”计划，打通了苏北、苏中、淮北、淮南地区之间的联系，揭开了华中地区抗战战略大反攻的序幕，被陈毅等人誉为“首创了华中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”，成为新四军华中地区歼灭战的典型战例。



车桥战役中，我军官兵在做伏击日军准备。(资料照片)

攻坚打援，夺取车桥。1944年3月5日凌晨1时50分，攻城部队按预定方案出击，战斗打响。攻城部队避开外围据点，采取远程奔袭方法，利用夜暗掩护，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，以隐蔽迅猛动作，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猛烈进攻，直取车桥两翼。突击队员们越过外壕、架起云梯、攀上围墙，展开攻击。不到一小时，我军便次第突破围墙，攻下10余座碉堡，占领镇内全部街道，分割包围镇内各据点日伪守军。随后，在师炮兵大队火力支援和掩护下，新四军采取分散突击、各个击破的战术，逐个攻克敌碉堡，消灭敌火力点。我军突然攻击，使敌完全被动。经过激烈战斗，当天中午全歼镇内一个伪军大队，并将日军压缩在核心工事内。下午2时许，我军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开展攻击，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，残敌固守挣扎。

与此同时，新四军强攻车桥，出敌意外，使淮阴、淮安、涟水等地日军极为震惊，增援车桥。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打响。5日下午3时，当第一批援敌赶到我芦家滩伏击阵地时，1旅第1团潜伏部队猛烈开火，迎头痛击。后又在韩庄附近闯入第1团预设的地雷阵地，死伤惨重，锐气大挫，被迫退守韩庄。接着，第二、第三批援敌，先后进入韩庄，与第一批残敌会合。第1团采取正面打击和侧后方突击相结合的方法，再给援敌以沉痛打击，迫使援敌狼奔于韩庄。晚7时，援敌再次集中主力企图从正面突破，但遭我军压制，未能得逞。随后，第1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总攻，与敌白刃肉搏，歼其大部，残部向西逃窜。其间，日伪军见我正面防御固若金汤，遂集总200余人，企图乘夜暗悄悄从我狙击阵地右翼向东北进入草荡，摆脱我军，继续增援车桥。我军早有预料。第1团和泰州独立团立即予以堵击，歼其一部，其残部逃向小马庄后也被歼。

6日2时，增援日军伤亡惨重，向韩庄东北突围，在芦家边，被我切成三段，大部就歼，少数在第四、第五批增援日军的接应下，乘车逃窜。在围攻车桥和芦家滩阻击战激烈进行之时，宝应、曹甸等地日军百余人，企图向北增援。当进至大施河时，敌触发我预设地雷，同时遭到我阻援部队迎头痛击，被迫原路撤回。7日拂晓，敌援军大部被歼，残部乘隙狼狈逃窜淮安。

乘胜追击，战斗告捷。车桥战役对华中乃至全国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敌驻淮阴地区之华北派遣军第65师团72旅团60独立步兵大队大队长三泽战死，在敌军官兵中引起很大震动。敌军有生力量大部被歼，因兵源不足和战线太长，日军已无力予以补充，战斗力大大削弱。从此，驻扎淮安、淮阴地区的日军无力发起大的攻势行动。驻车桥及其周边的日伪军如惊弓之鸟，龟缩至淮阴、淮安、宝应和石塘、赵徐等城市及周边据点困守。驻苏中、淮北、淮南一带的敌军士气也一落千丈。我军乘胜追击，扩大战果，以多路小队挺入车桥周边地区，至13日相继收复曹甸、泾口、泾河等敌伪据点10余处，使淮安、宝应以东纵横50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。至此，车桥战役胜利结束。

车桥战役共消灭日军大佐以下465人(生俘24人)、伪军480人(生俘168人)，攻克车桥及周围据点12处，摧毁碉堡50余座，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，创造了华中新四军一次战役歼灭日军人数量最多的辉煌战绩，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，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，使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折。

在车桥战役的鼓舞下，我新四军各部相继对敌发起攻势，不断出击，捷报频传。随着苏中根据地及其周边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，苏中党、政、军领导机关都移驻到车桥、曹甸地区，并组建苏中区委党校。车桥也成为我军抗战反攻的重要基地，也为新四军渡江南下，开辟苏浙皖边新区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(据《学习时报》)

读史忆人 典故

还清本金还利息

章士钊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人士、学者、作家、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。青年时，章士钊赴武昌两湖书院求学，结识了同学黄兴，后参与组织华兴会并辗转多地开展反清革命。

1917年，章士钊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。在他的推荐下，李大钊、杨昌济也来到北大任教。1918年，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来到北京，经杨昌济介绍任北大图书馆馆员，并与章士钊相识。

1922年，受周恩来之托，章士钊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到德国，支持周恩来在欧洲的革命活动。

1927年初，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，由于李大钊当时工作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，奉系军阀当局暂时没有动手。章士钊专门让夫人吴弱男去苏联使馆，劝李大钊出国躲避风头。后来，张作霖派人冲进苏联大使馆，逮捕了李大钊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章士钊立即找到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，称李大钊名闻中外、深得人心，言辞恳切地奉劝奉系不要以一时之意气，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。杨宇霆闻之悚然，乃向张作霖进言，认为李大钊为著名学者，建议保住李大钊性命。张作霖一度对杀害李大钊动摇迟疑，但最终仍决定组成特别法庭，判处李大钊绞刑。噩耗传来，章士钊悲痛不已，作诗悼念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。双十协定签字后，毛泽东因事留在重庆。章士钊深知蒋介石的阴谋，在手心写一“走”字，提醒毛泽东为上策，劝其速离险境。

1949年9月，章士钊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章士钊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，全国政协常委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。

1960年，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关心下，章士钊搬进北京东城史家胡同51号院。1963年，毛泽东和自己的英文教师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闲谈中忽然说起1920年向章士钊借款两万银元的事。他说：“你回去告诉行老(章士钊字‘行严’)，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，一年还两千元，10年还完两万。”没过几天，毛泽东果然派人送来了两千元。

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：“主席当真还债了。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，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，当时的银元是券集来的，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。”

当章含之把父亲的话带给毛泽东时，毛泽东笑了：“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？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？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，一生无钱，又爱管闲事，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。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，他是不会收的，所以我说还债。你就告诉他，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。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。”

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，章士钊因病住院，毛泽东问章含之，2000元送到没有？章含之说，当年说10年分期偿还，去年是最后一年，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元已经还清了。毛泽东说，怪我没有说清楚，这个钱是我给你那位老人的补助，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。从今年开始还利息。五十年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。就这样还下去，行老只要健在，这个利息就还下去。

(据统战新语)

骑马游街采摘名花 雁塔题名曲江宴饮

古人“高考”放榜后都怎么庆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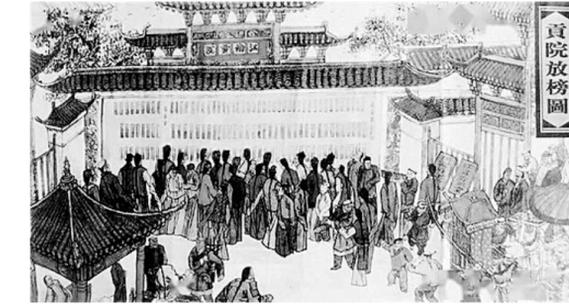
刻碑记名

大雁塔下题写名字 后进者效仿成风俗

开榜之后，还有一些庆祝的仪式。比如进士们可以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专门的石碑上，永远流传后世。现存于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，就有198块进士题名碑。上面刻录了元明清三朝的51624名进士姓名。其中包括于谦、袁崇焕、林则徐等文化名人。

在唐朝，就有了雁塔题名的传统。雁塔题名的风俗大体起源于唐代宗时期。传说代宗大历年间的进士韦肇(另一说始于张莒)，在金榜题名后，偶然在大雁塔下题写了自己的名字，引起后进者纷纷效仿，于是新进士雁塔题名就演变成一种风俗。从唐朝到明清，把自

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的石碑上，成为新进士甚至是读书人心中最骄傲的事，被称为“天地间第一等人第一等事”。在雁塔题名的人当中，最出名的要算是白居易了，他27岁一举中第，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，写下了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的诗句。



《贡院放榜图》记录了明清时期乡试放榜的情形：榜下的人摩肩接踵，争相观看。

曲江宴饮

从AA制到政府包办 官员带上家眷参加

开榜后新科进士们第一个大规模宴会，往往在长安城皇家园林的曲江池举行。“曲江宴”就设在岸边的杏园内，因此也被称为“杏园宴”，又因为正是杏花怒放时，所以红杏又被称为“及第花”。长安城的达官贵人带上儿女家眷一同参加，一来让儿女以进士为榜样，二来结识未来的新同僚，再者也为自家儿女挑选如意郎君创造机会。

这个宴会最初是半自发性质的，由进士们凑份子钱进行庆祝，称“餽钱”。虽然前三甲可能出钱要多

一些，但基本上，大家都是AA制。随着活动影响不断扩大，政府开始包办。从五代时周世宗柴荣开始，政府正式派官员主持宴会。宋朝则继承了前朝，而且赐钱更多，有“诏复增进士钱百万”，并赐“酒五百壶”。此外，还有相宴和关宴。相宴是新进士高中后请当年的主考官吃饭，感谢主考官的慧眼识人，顺便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铺路，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关宴是新进士们庆祝活动的高潮，也是一系列宴饮活动的总结。

延伸阅读

进士杜羔早年落第 妻子作诗心情羞愧

与中举者出席各种酒会宴席的风光相比，那些落榜的文人们只能仰天长叹，收拾行囊回乡以备下届再考了。

唐人吕岩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，可见科考之难。然而，毕竟大多数人是落第者。唐代进士杜羔早年落第回家，其妻赵氏作诗《夫下第》曰：“良人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回。如今妾面羞君面，君若来时近夜来。”赵氏把丈夫落第当作很羞愧的事情，生怕人知道，可见人们对科举中榜的期望之大。

晚唐著名诗人许浑写过一首落第诗《送杨东归》：“红毡半落燕于飞，同客长安今独归。一纸乡书报兄弟，还家羞著别时衣。”同乡杨发和他一起参加科考，榜发金榜题名，自己却名落孙山，于是连离家时的衣服都无颜再穿，心情沮丧又羞愧。

(据《厦门晚报》)

李达：主动降低居住标准

李达：主动降低居住标准

开国上将李达特别注意培养子女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，在饮食上极为节俭，几任炊事员为此“抱怨”：“你们吃饭真简单，在你们家练不出手。”在住房方面，李达从来都是降低居住标准，在1955年初进京任职期间，就让出了一套二进院，全家挤在南长街附近胡同的一家小院里生活，即使到了1973年房屋年久失修，已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达依然坚持住在原地，几次拒绝管理部门提出的按照标准重新给予分配住房

的建议、规划。1983年，房管部门决定全面维修已成为危房的李达的卧室，动工之前，派人来商量修房的方案。此刻，李达因身体不适，正躺在卧室休息。听说房管部门派人来研究修房方案，他拄着拐杖来到办公室，高声说：“我的意见是一一因陋就简！因陋就简！”这两个“因陋就简”，为这次修房定下了基调，结果上级批下来的有限的修缮经费，还节省了。 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瞿秋白的两首诗

雪意

雪意凄其心惘然，江南旧梦已如烟。天寒沽酒长安市，犹折梅花伴醉眠。

1932年12月7日，瞿秋白将这七绝诗赠鲁迅；其时，他因“紧急情况”避难于鲁迅家，地点在上海多伦路旁的拉摩斯公寓(今四川北路北川公寓)A三楼四室。诗后自注：“此种颓唐气息，今日思之，恍如隔世，然作此诗时，正是青年时代，殆所谓‘忏悔的贵族’心情也。录呈鲁迅先生。”

《雪意》作于瞿秋白落脚北京不久，大约在1917年底或1918年初。北国冬景自然与江南风光迥异，雪意深厚，睹物思乡，原是情理中事；而心生“惘然”，却是由自身境遇与遭际长出的“颓唐气息”。自1916年2月8日(农历正月初六)瞿母金衡玉因贫无力还债而自杀弃世后，瞿秋白又经历了武汉之行、流落北京、俄罗斯采访等，流转迁荡，其情亦

哀！但他无暇流连于陈年旧事，他向过往匆匆一瞥，便继续行程。1923年的瞿秋白是非常忙碌的，他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上海广州之间，意气风发地投身于革命事业。1923年12月，在给女友的信中，他将自己喻为——“江南第一燕”：

万郊怒绿斗寒潮，检点新泥筑旧巢。我是江南第一燕——为街春色上云梢。

对比1917年写就的《雪意》，从“雪意凄其心惘然”到“万郊怒绿斗寒潮”，从“江南旧梦已成烟”到“我是江南第一燕”，心境从怅惘转向热烈，诗境由凄婉转向旷达。“人生的意义，不再‘昏昧极了’，‘避世’的人生观和‘唯心的厌世观’已为旧日心魂；这个‘东方稚儿’经受痛苦的切身体验，终于寻得‘一条光明的路’，他的个体生命已经汇入民族和国家的艰难行程中了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骑马游街

“探花郎”风光无限 可人名园采摘名花

在古代，科举考试是学子们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，他们一样要经历考试后的焦急等待，经历放榜日心情的忐忑不安。新科及第的人，要参加谢恩、过堂、期集等一系列活动。金榜题名之后相聚宴饮，更是中国古代的传统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古人“高考”后是怎么嗨的。

在唐朝，同榜进士还会推举两位年纪最轻的当“探花使”，让他们进入全长安的著名园林去采摘名花，亦称“探花郎”。在这一天，长安城中所有的私家花园都会向这两位探花使开放。唐代孟郊在《登科后》写到：“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孟郊登科时已经46岁了，虽然当不上“探花郎”，恐怕也兴致勃勃地游玩了一番。

传胪之后，就是游街。由朝廷仪仗队一路扈从，把新科进士送入一个指定的聚集地点。这个聚集地点，唐朝时一般是在主考官家附近临时租的一个大房子，称“期集院”。到了北宋，则一般在太平兴国寺或大相国寺(都是国家寺庙)，南宋则一般在贡院内。从出宫到集所，一路上人潮拥塞，路人争相观看，场面相当热闹。新科进士们骑着高头大马，真正是风光无限。